



战火染红 青春岁月

人民日报口述历史（第一卷）

钱江◎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013041411

G219.23

05

V1

战火染红青春岁月

人民日报口述历史
(第一卷)



G219.23
05
V1



北航

C1649873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火染红青春岁月：人民日报口述历史. 第1卷 /

钱江主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8

ISBN 978 - 7 - 5115 - 1287 - 1

I. ①战… II. ①钱… III. ①人民日报社—史料

IV. ①G219.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1883 号

书 名：战火染红青春岁月——人民日报口述历史（第一卷）

主 编：钱 江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曹 腾

执行编辑：田玉香

校 对：李俊华

封面设计：索美文化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65369530

编辑热线：(010)65369523

网 址：[www. peopledaily. press. com](http://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 1000mm 1/16

字 数：240 千字

印 张：21

印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5 - 1287 - 1

定 价：49.80 元

目 录

办报，一路不停地办报	安 岗 (1)
青春岁月中的追寻与突破	李 原 (15)
战火中的青春永难忘	吴 象 (24)
我的秘书长生涯	郭 渭 (32)
从《晋察冀日报》到《人民日报》	陈春森 (38)
烽火染红我的人民日报岁月	陈泽然 (45)
奔向革命，奔向胜利	周 明 (55)
我的人生属于人民日报	程庆丰 (61)
在前线向《人民日报》发报	张连达 (68)
令人怀念令人激昂的日子	姚力文 (71)
我设计了《人民日报》版式和报头	何燕凌 (79)
追求自由平等，投身革命洪流	宋 琤 (90)
“进京赶考”办党报	林 洪 (96)
生命中的激情岁月	林 晰 (99)
刺刀枪换肩，校对笔上手	陈瑞卿 (106)
早期人民日报供应工作	耿玉云 (110)
相逢相知在太行	赵培蓝 (113)
青春汇入飞扬的电波	伊 之 (123)
我和尊敬的首长张磐石	张喜才 (130)
战争中收录新闻	左 录 (136)
我是人民日报“土记者”	张布克 (141)
一生新闻生涯的开端	夏 雨 (146)
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前前后后	陶 涵 (152)

与人民日报 41 天情缘	陈 骥 (160)
新中国的诗意追寻	柏 生 (167)
我的青春我的梦	金 凤 (172)
甘当办报“孺子牛”	寿孝鹤 (179)
火样燃烧的往事	古 进 (186)
从无声报纸到有声电波	张文昭 (193)
结缘报纸的源头	胡青光 (195)
为创办“大党报”打前站	赵继英 (199)
亲历人民日报印刷厂的创建	李焕新 (202)
人民日报电务部锤炼了我	刘芳洲 (209)
人民日报译电科工作回忆	梁会人 (212)
下太行，进北平	刘振祥 (215)
战争岁月的人民日报资料组	乔雨舟 (222)
里庄，人民日报，清华大学	吴英禄 (228)
印刷路上一路奔跑	曹德贵 (233)
我负责的人民日报排字房	周景融 (236)
我是报社电讯兵	赵景星 (238)
血海深仇，激发我走上革命路	刘治平 (242)
战斗中的排字岁月	范守田 (246)
不停歇的通信脚步	宇文喜 (251)
最先看到胜利消息的人	彭立星 (255)
一生和印报机作伴	曹广兴 (259)
由报务摇机员到邓拓警卫员	韩增玉 (261)
伯父引我走上革命路	宋儒贤 (264)
从新四军女战士到人民日报校对员	姚 勤 (268)
没有人民日报，就没有我的今天	贾 锟 (273)
父亲、丈夫、报社和我	赵改芬 (277)
初到人民日报的日子	郝菊鲜 (283)
绿叶对根的情怀	秦翠香 (288)
一步步走向人民日报	万 青 (292)

追随人民日报奋斗的足迹	周 平 (295)
我的报务员生涯	苏 琴 (298)
党报工作中的平凡人生	赵殿臣 (301)
做人民日报好后勤	刘 斌 (304)
人民日报是我永远的家	张桂云 (308)
跟随父辈投身红色党报	刘义庭 (317)
15 岁, 我当人民日报通信员	顾英杰 (320)
向新闻前辈鸣谢	(325)
后记: 向战争年代新闻前辈的崇高敬礼	钱 江 (326)

办报，一路不停地办报

安岗

10岁就想离开家

1918年12月20日，我出生在天津一个洋行职员家庭，原名安正元。祖父、父亲都在外国人的洋行里做小职员，父亲在德国洋行，祖父在英国洋行效力。我小时候家里还有钱，主要是祖父挣的。但是父亲没好好过日子，抽上大烟了。我看到这情形感觉不好，想离开家，当时我大约10岁。



安岗，1948年春在河北武安

我父亲前后娶了3位夫人。第一个夫人闷闷不乐早死了，以后娶了我母亲，生了我。我在家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个姐姐，她是父亲的第一任夫人生的。我父亲又娶了第三位夫人，住在外边，后来去世了，她的孩子就搬到我们家里。我们兄妹一共10人，男的4个，女的6个，我在男孩子中排行老大。

我们家是一个大四合院，有10多间房子，10个孩子住在一起。父亲鼓励我们出去闯一闯，我经常不在家。他说，天津人没有地，也没有房子买卖，只有出去找饭吃。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父亲去世得早。快解放的时候，母亲知道我要回来，想我想得厉害。解放后我几次回天津看望母亲，有时也接母亲来京小住。母亲在天津有弟弟照看着。兄妹中只有我在北京，其他人都在天津当工人。

家庭里与我关系最亲近的是大姐安正华，她长我11岁。大姐夫解放前就死了，大姐给人家当佣人，生活很艰难。解放后我把大姐接来，她在我家生活了47年，活到90岁，1997年去世，她帮我们带大了4个孩子，掌管全家

的生活。

小时候，我在家里比较自由。小学上了没几天就不上了，觉得老师教得不好。后来听说私塾好，又上了半年。私塾老师打学生，我也挨过一次打，还报复了一次。我在椅子上弄了一摊水，他一坐，就把屁股弄湿了。老师很生气，要赶我走，我说：“你不用赶，老子不在你这儿呆了。”

大约1933年，我到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工商学院读书。这个学校像是大学，确切说就是中学。教英文的老师是英国人，叫博爱考特（boycott），英语boycott是“抵制”的意思。我和他关系不错，学了半年英文。解放后的50年代，他儿子在香港做生意，到北京参观，我负责接待，无意中聊起当年，就和他儿子认识了。

我在工商学院上了半年，学校管得严，不让随便说话，我接受不了。只要到了念书的时候，我经常溜出校门到附近的农村去蹓跶，对农村发生了兴趣。

当时，我在美国的要好同学盛景仁来信，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同意接收我，还有奖学金，让我去美国，我没去。改革开放后，我到美国考察，还专门去威斯康辛大学看了看。

离开工商学院后，应该是1934年，我考上了汇文中学。汇文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办得出色，教学思想比较自由，可以宣传抗日，我最看重这一条。我的家就在日租界边上，我亲眼看见日本兵打中国人，所以从小就恨日本鬼子。我在汇文中学参加了多次学生运动，天津“12·9”运动我也参加了。当时周恩来到过一次汇文中学。中共在天津负责人认识我，找我谈话，让我参加党，我拒绝了。我觉得闹革命就要到外地去，在家里闹，弄不好的话，一家人都会受牵连。

寒假为《益世报》写稿

1935年圣诞节之后，我给天津《益世报》社会服务版主编吴秋尘写了封信，希望利用寒假作为“新闻记者的实习”。当时我正准备报考燕京大学新闻系或中央大学新闻系。我在信中附了一份采访提纲，采访对象有教员、实业家和艺人。没想到吴主编把我的信和采访提纲全文刊登在12月29日《益

世报》第九版上，标题是“一切青年都该想想‘寒假做什么’”，还加了编者按。

这对我是个极大鼓励。寒假刚开始，我采访了河北工学院造纸学家杨十三先生。稿件很快见报了，吴主编还加了一个很热情的按语：“第一次稿件来了，写得很不错，我们觉得他的确是个有希望的青年。”他还带我去看天津李善人开办的粥厂。李善人家里很有钱，冬天在天津几个大地方，用草搭建一个席棚，施舍粥。

很快，我又采访了实业家胡道远、乡村民众教育家胡勤业，还有年轻的戏剧家、《雷雨》作者万家宝（曹禺）。采写的文章在《益世报》上都登了。我还和几个同学徒步到农村，访问了老农夫、校长、警察、乡长等，在《益世报》上连续报道，前后有16篇4万多字。当时梁漱溟等人认为，在中国农村，首先要让地主富，然后农民才能富。我写文章跟梁漱溟他们辩论，主要在《益世报》上发表。

我很感谢吴秋尘先生，他这个人很好，但命运不好。解放后，我去天津找他。《益世报》停刊了，没有找到他。据说，吴秋尘被安排在北京一所中学当老师。他说话比较自由，后来被打成“右派”，送到东北劳动，死在那里。其实这个人是相当进步的。

给天津《益世报》投稿，使我明白了新闻可以沟通读者，利用新闻能够推动经济、政治发展，这是我走上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汇文中学，我订了一份英文报叫《North China Star》（《华北明星报》），上面登载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每天都看，从报上了解朱德、毛泽东的情况。我从小就看各种报纸，感觉蒋介石和毛泽东不一样，报纸骂毛泽东，骂不出什么道理，蒋介石挨骂却有理有据。

1935年夏天，我从汇文中学毕业了，家里也管不了我了。我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社会，觉得在中国只有革命才有出路，而革命的道路在农村。

这时正赶上日本人通缉我，天津党组织把我介绍给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我瞒着家里人说要报考燕京大学新闻系，父亲很高兴地送我上路，我没来得及给吴秋尘先生道别。后来没了我的消息，父亲很担心我，精神上受到刺激，整天叫着我的小名。

在天津，还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他就是罗隆基，他每天给《益世

报》写社论。他的社论很有抗日激情。日本人放出风来说，如果他每星期还去天津青年会演讲，就要暗杀他。听到这个消息，我每星期都去青年会，看罗先生是不是还去演讲，看是不是有人要暗杀他，如果要暗杀我能不能助罗先生一臂之力。他写的抗日社论，义正辞严，我认为这是我的榜样。

1936年冬天，我离开天津到北平，那年我18岁。

薄一波给我改名字

离开天津到哪里去？

当时我有4个地方可以去：一是东北，但是日本人占了，去不了；一是山东，地方太小；再一个去南京或上海，也不能去，蒋介石在那儿，我是反蒋的；西南不能去，太远，没有战争可以打。我选择去山西，因为在北平有人向我介绍了山西来的薄一波。我想，山西再不行我准备到延安去，那时红军刚到延安。

1937年4月，我第一次见薄一波，是在北平他的办公室里。那时，他刚从国民党草岚子监狱释放出来不久，身体比较清瘦。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CP（共产党），还是CY（共青团）？”我说：“我是相信真理，愿意为真理奋斗的人。”听了我的回答，他笑了起来。然后谈到我的名字，他说你的名字“安”是原来的，“钢”是后改的。我说是。

他问我原名叫什么，他还说，你现在名字中的“钢”字在俄语读音是“斯大利”的意思。有人知道你名字背景，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对你不利。他就把“钢”改成了“岗”，就是我现在的名字。

我问什么时候能打败日本？他拿出延安出的一本杂志《解放》，上面登了毛泽东的讲话，说最后的胜利肯定是我们的，但什么时候胜利我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这要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果我们的力量对比超过敌人，就是胜利的开始。我看了这本杂志，同意这个观点。在薄一波那里，他讲的最多的是毛泽东。

当时薄一波处境不算好，延安有人不信任他，因为薄一波得到阎锡山的信任。其实他是按照中央指示与阎锡山搞统一战线合作抗日的。薄一波提出了“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工作”三句

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1937年初，我刚到太原，分在“民众训练团”一队，指导员是刘有光。有一天晚上，刘有光悄悄告诉我：宋哲元逮捕你的通缉令已经到了太原，一波让我告诉你，山西会保护你的，你知道就行了。

这年春天，我作为薄一波“牺盟会”的宣传委员，到了山西平定、晋阳、榆次、阳泉，组织民众，收集和运输武器，为创建抗日根据地组织游击队做准备。

1937年11月，我在山西和顺县入了党。入党介绍人是毛铎。记得第一次参加党小组会议，一个老党员说：“为了保卫苏联，必须组织百万中国工农红军。”我当时不知道这是第三国际的意见，贸然地说：“最好把保卫苏联与保卫中国结合起来。”老党员们看我是新党员，并不介意，开导我说：“工人无祖国，我们就是要绝对服从第三国际。”我没有再说什么，但心里只认定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是为了中华民族独立和富强的，中国民族革命应该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上太行山办《胜利报》

在和顺县石拐镇，我和河北的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当时石家庄市委书记陶希晋也在石拐镇。陶希晋那时对薄一波认识得很不够，认为我是薄一波派来的，对我不太信任，还对我审查了一段时间。审查后，大家都认为我是真的共产党员，陶希晋也就不说什么了，还给了我100多人，几十条枪，让我当游击队长去打日本。

我很高兴，但这100多人的吃饭问题不好解决。幸好那天晚上我们走到了一个地主庄园，就在那里住下了，把吃掉的东西换算成钱，放在那里。我正为这百来号人吃饭发愁，正巧碰到了晋中八路军独立支队政委赖际发，他说，你到我这来吧，我这有饭吃，也有枪。我就到了他的部队。我带的100多人编到他的连队里，部队有个宣传科，我就当了副科长，正式当了八路军。

1937年冬天，朱德总司令率领一支八路军部队来到了和顺县石拐镇。那天天气很冷，我们都很兴奋，爬上山头，去迎接朱总司令。我第一眼见到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却是个女战士装束的外国人。心想，这大概就是通知上说的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了。她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低着头，用笔很快地写着什么。我很兴奋，跑到她身边，用英语跟她打招呼。

她很吃惊，抬起头来，问：“你是个年轻的战士吗？”

我说：“是的，我是个战士，也是个 Journalist（新闻记者）。”

她一听，很兴奋，惊奇地问我：“你们有报纸吗？”

我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报纸，等建好根据地后，我们就要办正式的报纸。”我告诉她，只要打了胜仗，就会有战利品，就会有印刷机，有纸张。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技术工人，实在不行，我们可以请苏联的印刷工人来帮忙。

她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用英语说：“你们这些小伙子真棒！”

不一会儿，朱总司令来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群众情绪怎么样？”

我说：“老百姓的情绪是稳定的，老百姓都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日本鬼子打来了，国民党军队下太行山跑掉了，共产党军队上太行山来，同老百姓一道抗击日本鬼子，保护老百姓。老百姓是相信我们的。但也有些人不相信我们会胜利。”

朱总司令沉思了一会儿，说：“战争要持久打下去，老百姓眼前还看不到什么时候能获得胜利，产生疑虑是很自然的。我们要靠前线部队打胜仗，扩大和巩固根据地，老百姓才会解除疑虑。”

朱总司令问我：“你多大了？”

我说：“19岁。”

朱总司令又问：“你是文化人？”

我说：“文化不多。”看到朱总司令很和善，我鼓起勇气说出了在根据地办一张正式报纸的想法。

朱总司令很认真地问：“你会办报？你能办报？”

我回答说：“不，我从来没有办过报，但我相信能办好。”

“那好，建好了根据地，你就办报。”朱总司令肯定地说。

我受到了鼓舞，又问：“那这个报叫什么名字好呢？”

朱总司令想了想说：“就叫《胜利报》吧。我们要告诉人民，正义战争必胜。”

受到了朱总司令鼓励，我立即向特委书记陶希晋做了汇报，设法找到4台旧印刷机，办起了印刷厂。朱总司令题写了报头。1938年5月1日，我就在太行山上办起了第一张报——《胜利报》，我担任总编辑。

一开始，出版的是8开油印小报，后来有了3台石印机，改成石印报。到了1939年末，晋冀豫根据地成立晋南银行，印刷晋鲁豫和晋南根据地货币，就把我们的3台石印机和技术工人全部调走了。我们想了好多办法，搞到一架印刷机凑合着用。后来，我听说归阎锡山“民族革命通讯社”的“上党分社”建制要撤销，就赶紧向上级努力争取，把“上党分社”建制归到了《胜利报》，这样，我们终于有了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有了中外电讯稿。

后来，我还组织成立了“胜利丛书出版编辑部”，自己刻印出版了《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等大部头书籍，出版了小学课本，报纸也没耽误出。

我办报专门找有军队有枪的地方。由于敌人扫荡频繁，《胜利报》没有固定住所，经常搬家，3年多搬迁20多次。报社人员是一支新闻队伍，也是一支武装部队。报社大部分人员编为战斗组，到游击区或敌占区去，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做战地采访。一场战斗过后，人员虽然分散四处，但能很快集中起来，继续出报。解放后，在南京原中央档案馆找到30多期《胜利报》，现在已影印成册。

1941年3月，晋冀豫边区政府成立，《胜利报》更名为《晋冀豫日报》，上党分社更名为新华社晋鲁豫分社，我任副总编辑。后来敌人扫荡加剧，根据地“精兵简政”。1941年底，《晋冀豫日报》停刊，并入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我也到了那里。何云是社长，陈克寒是副总编辑，我担任社论委员，接替第一任社论委员陈克寒的工作，主要负责写社论。当时北方局要求每两天写一篇社论。在我那本《十七到七十》书里，编辑有个统计，说我大约写了200多篇。

朱总司令说，“一份新华日报，等于10万军队！”日本鬼子对《新华日报·华北版》非常憎恨，1942年5月，对太行实施“篦梳式”大扫荡，包围了报社，突围中社长兼总编辑何云等46人牺牲。

1943年10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我任副总编辑。

替高树勋将军写通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成立了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刘伯承任司令员。我当时有两个头衔，一个是《新华日报·太行版》副总编辑，一个是新华社特派记者。我被派到平汉铁路参加平汉战役，解放平汉铁路，接受日本投降。我们记者组有3个人，我、管电台的张连德和一个马夫。我一个人又是记者又是编辑。

邓小平对我说：“不要回太行了，跟着我走吧。”当时晋冀鲁豫军区就在峰峰矿区。不久，我跟着刘邓首长到武安县伯延村驻扎。

有一天，邓小平对我说：“安岗，高树勋要起义了，你去看看吧。”我就跟着刘伯承去了。在高树勋那儿呆了一个星期。高树勋起义的稿子都是我写的。记得高树勋将军在邯郸起义后和党中央商量，要给蒋介石发一个电报，陈述对时局的看法。组织上让我起草这份电报，字数为2500字，要用高树勋的语言，要用点古文，给我3天时间。我当时不知深浅，头一天在古文上咬文嚼字。当时朱穆之、陈希玉和我住一间屋子，我就和他们商量，到底怎么写？他们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反正“装腔拿调”就是了。最后，通电写成了，延安新华社一字不改发出来了，还登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太行版》重要版面上。高树勋将军见了我说，你代我写的通电，够味，我很满意。毛主席看了也很满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高树勋将军发来贺电，中央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总司令。解放后，高树勋将军担任河北省副省长。

不久，我又接受了采访被俘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长马法五的任务。马法五根本不把我这个年轻记者放在眼里，傲慢地对我说：“我是奉蒋委员长之命，来接受日本人投降，你们如果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为什么不让我受降？”我回答说：“你看看地图吧，你说是受降，为什么偏偏跑到解放区来打共产党呢？”辩论十分激烈，整整进行了3天，马法五终于发表了一篇谈话。我将他的谈话稿写好后交给他本人看，他看了两天后退回时说：我说不过你，要发表也可以。这篇谈话发表在1945年11月延安的《解放日报》上。

记得当时经常听刘邓讲，打完了仗，形成我们自己大片的解放区，就要

办报。刘伯承有一次开会说：我们现在除了打仗还要打笔墨官司。那时，我几乎每天写一两条新闻，刘伯承经常把我找到他办公室去，有时一天去3次。我写的稿子都经邓小平审阅，有时能顺利通过，邓小平说不行，就得重写。

平汉战役结束后，领导告诉我，革命需要武装，需要政权，也需要报纸。我奉命参加筹办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

土改中，华北局保护了我们

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正式创刊。以《新华日报·太行版》人员为基本班底。社长和总编辑由当时晋冀鲁豫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担任，我是副总编辑。编辑部同志一起商量，起了《人民日报》这个名字，并请延安的毛主席题写了报头，薄一波带了回来。邓小平对《人民日报》的创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邯郸火磨街的小白楼上，正式挂出了“人民日报报馆”的牌子。我们在邯郸时间不长，一个多月以后，国民党进攻解放区，人民日报转移到了河北武安县的南文章村和河西村。

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晋冀鲁豫解放区是较早开展土改的地区，中央局决定在6、7、8三个月集中开展土改运动。

根据“五四”指示精神，让一些地主自愿献出土地，首先让地主出身的党员干部带头，说服自己家里人主动无偿献出土地。这样做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在各解放区，都出现了党员干部主动献田的情况。我当时负责外勤采访，认为在晋冀鲁豫边区应该有这么个典型。恰好，报社附近伯延镇上有一家有名的大地主，他家有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党员干部翟世贤。我就找当时在伯延的新华社记者联系，找到翟世贤，跟他一说，他表示完全同意，说服家里献出了田产200多亩，房屋200多间，还有价值数百万元的衣物用具。《人民日报》就在1946年8月2日2版刊登了《主动帮助农民翻身 翟世贤献出大部田产 武安县号召干部首先响应这一行动》的消息。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开明绅士纷纷响应，献出自己的田产。《人民日报》都作了报道。

但是到了9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总结土改工作时，认为不少地方工作

粗糙，贫雇农不满意，存在“富农路线”。中央局要求全区开展翻身大检查，也叫“填平补齐”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47年2月。这次“填平补齐”运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的倾向。人民日报驻地附近的多个村庄，出现了乱打乱杀现象，对地主进行“肉体消灭”。“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出现在《人民日报》标题中。

为了纠正“填平补齐”问题，晋冀鲁豫解放区又组织了土改复查。人民日报也组织土改工作组到武安县十里店工作。

我是人民日报土改工作组副团长，主要领导报社所在地河西村的土改。我们没有打人，比较平和，对这个村各方面比较照顾，跟农民的关系特别好。我们没有动中农的任何东西，就是把地主的東西搬到一个地方，但是财产怎么分定不下来，害怕“左”了。

土改开始的时候比较“左”，给下面的指示是，对地主打几下也可以。有的地方逼着地主交浮财，有打死人的。后来毛泽东说要给地主留一些东西。我们给地主分了地，还分了东西，地主自有资产一律不动。这样做比较稳妥。不然这个社会减去一个贫农，增加了一个没有东西的地主，还是不好。

但是，1948年1月，我和李庄为翟世贤献田一事做了检查，而且上纲上线到“不负责任的‘客里空’作风”以及“地主思想”。这个检查是违心的。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当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们这么做，写这个检查没有请示上级，是我们两个人主动写的。因为当时的空气是“左”的。认为搞献田是取消土改。其实这个逻辑是错误的。我们检讨说献田是不对的，应该斗争，斗争的对象是我们的干部。翟世贤因为这篇报道受到了冲击。我们的干部有不少出身富裕家庭，其实已经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像翟世贤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干部，他受了很大委屈。

那时，华北局保护了我们，没有把这个事情扩大化，不了了之。

华北《人民日报》和我的家

1948年，形势发展很快，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6月15日，在河北平山县里庄创办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张磐石担任社长兼

总编辑，我担任副总编辑。

创办华北《人民日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机关报做干部准备，为北平、天津、华北地区一些党报派出骨干。这是刘少奇当面给我的指示。

为了充实人民日报的力量，华北《人民日报》创刊后不久，大约1948年7月底，我到驻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招青年学生。当时华北大学校长是吴玉章，范文澜和成仿吾是副校长。我找到《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华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光年，要他支持学员办报。张光年一口答应，他对艺术学院文学组（相当于中文系）的同学说，谁愿意去人民日报工作，都可以报名。当时就有20多人报了名。

我对华北大学的了解，跟我的夫人樊亢多少有点关系，她是原北方大学的英文教师。她是1946年在西北大学闹学潮之后，到太行山解放区的。后来她的西北大学同窗好友齐越分配到人民日报社，是我接待的，时间长了就熟了。经齐越介绍，我认识了樊亢，开始通信。樊亢开始还有些犹豫，担心我是“骡马干部”（就是有骡子有马骑的“高干”），她不愿意走“骡马路线”，要自己独立工作。后来，她看我不是什么官，还像个知识青年一样，就同意了。我给她的信上有一句说：“我爱你，更爱新闻事业。”她不但没有生气，后来还告诉我说这样写让人感觉很实在。

1948年12月，我们在里庄结了婚。婚礼由张磐石主持，没什么仪式，中午食堂做了两桌菜，有肉，没有酒，报社一些人参加了。席间，有人提出，请樊亢唱支歌。报社的于风当时在场，她是樊亢的学生，喜欢唱歌，樊亢请于风替她唱了一首歌。我晚上照样上夜班。3天后，樊亢回华北大学了。当时没照相。后来，江横给我们照了张合影，我们还是穿着灰军装，戴着灰军帽。这张照片现在还保存着。

1949年3月，报社进城，路过正定，我在樊亢那儿呆了一天。华北大学是五六月进城的。

为人民办好报纸

1948年10月，有一天晚上，报纸已经付印了。我刚睡下，房间里的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